

近日,教育部在网上公布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要求各高校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

教育部提出,各高校要把创业教育教学纳入学校改革发展规划,制定专门计划,提供有力的教学保障;按照学生人数以及实际教学任务,合理核定专任教师编制,配备足够数量和较高质量的创业教育专任教师。

不仅如此,教育部还明确规定,要把创业教育教学效果作为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的重要内容,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并体现在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中。

从教育部的要求中,不难看出有关部门对高校创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意识到中国大学生创业能力亟待提升

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在高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配套条件的情况下,一刀切地要求高校开出“创业基础”必修课来,却令人有些疑虑。首先,谁来教课?是只有理论知识的高校教师,还是只有实践经验的创业成功人士?其次,教什么?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还是“真刀真枪”的市场历练?还有,如何评价教学质量与成果……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完善,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课程体系。同时,师资力量的形成也非一日之功。

与其在这些条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让“创业基础”必修课仓促上马,还不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请问,乔布斯、比尔·盖茨,谁又上过“创业基础”必修课呢?

中国大学评论

考务工作亟须还原专业主导

■储朝晖

2012 年度同等学力申硕考试发生“收钱改分数”的惊人事件,这再一次为中国各类考试的行政主导模式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已不止一两次,2007 年、2009 年、2011 年,医师资格考试出现“隔年泄”;2008 年、2011 年,业内视为最严最牛的注册会计师考试被曝泄题;2010 年、2011 年,湖南和广东高考先后陷入语文作文泄题风波;2012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英语科目开考前一个小时,广东、长沙、武汉、北京、太原等地考生收到了答案短信;2012 年,全国自学考试统考科目英语(二)的题目和答案考前 6 小时在贴吧流传。

就以最近高考中出现的数起事件来说:6 月 7 日下午 4 时 50 分,陕西子洲县第三中学考点数学考试中收卷铃声提前 10 分钟响起,播音员也立即发出终止考试的通知。一分钟后,错误铃声被纠正。然而不少考场内,监考老师已要求考生停止答题,并开始收卷,考场秩序一度混乱。不过也有一些有经验的监考老师恪守了下午 5 时结束考试的规定,并没有提前收卷。

6 月 8 日上午,湖南省洞口县九中考点信号员错发信号,原定于 11 时 30 分的交卷时间,结果在 11 时 25 分 12 秒敲响,导致考试提前 4 分 48 秒结束,直接影响了 1050 名考生。四川广元也出现了考场时钟慢半小时的事件。

每次出现这种事件的解决办法似乎都有一条:加强领导。这贴灵丹妙药多次使用依然出现各种问题,就应该深刻思考出现这类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事实上问题出在行政主导而非专业主导的考试上。

以上述高考出现的两件类似事件为例,其中又有细微的不类似,就是“有经验的监考老师恪守了下午 5 时结束考试的规定,并没有提前收卷”。这细微的不类似之处正是发现现行高考问题所在踪迹。弄错了时间这是考生都知道的事,事实上现有的高考差错还存在于考生不知道的环节,如出题、判卷、统计,甚至包括湖北那位周老师拿准证遭到歹徒袭击的事件。大量同类案例说明,这些环节出差错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现有的高考依然还是行政主导的高考,而不是专业主导的高考。它行事的准则是行政要求和指令,而非专业的标准。那些有经验的监考老师不小心暴露了高考行政性弊端马脚。

在行政主导的考试中,行政人员到考场巡视而不在于是否影响考生答卷,行政系统的各个部门都希望高考中充当一个角色来显示政绩,一些部门还想方设法尽可能张扬一点以突出自己,而不是大象显于无形地做好本取的服务工作,更难做到真正以考生为本,以考出真实的成绩为目标。

这种体制出了问题当然要官员负责,然而,往往出了差错之后哪级官员都无法负责。以高考发生的事件为例,对于某些考生,大约 5 分钟能答一道大题,可能拿到 20 分,而对另一些考生最后这点时间只是干坐着等待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分也拿不到,哪一级的调查、汇报、处理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考生的问题,考生情绪的影响更无法弥补,对出过错人员的处理也无补于考生的损失,最后依然只能是大事化小。

彻底的亡羊补牢之策就是尽快实现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类考试由行政主导向专业主导、行政辅助转变。考试背后的种种泄题作弊行为屡禁不止,考试的种种作弊反倒已经成了一条龙服务,这条龙的龙头是灰色的权力,解决不了对考试过程中灰色权力的监督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考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行政主导的考试模式下,行政权力自身不能有效监督自身,因而每次出事之后反复出现惩处力度不足,处罚主体不明,违规违法成本过低,抓住小鬼放走妖精,投机随处可能发生的循环。比如说出现泄题,就应该是出现了高于专业权力的行政权力发生了作用。

实行专业主导的考试才能实现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主体分离和分明,只有在考试的主导人员已经丧失了行政主导时所掌握的绝对权力时,政府管理机关和社会公众才有可能依据专业的规范对考试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问责,若不遵守这些规则,就要被踢出局。也只有在于赋予专业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受任何行政权力干预的权力,才有可能抵制行政权力指使下的违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人员就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只有在过程透明且能实施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遏制泄题、卖答案、改分数等投机行为的出现。

考试原本就是一项专业工作,而不是一项隶属于行政部门之下的“任务”。对学业和能力的专业测试是世界的通例,专业的含义包括考务在内每一个岗位上的人员都是专业的,未能获得相应岗位专业资质的人不得参与相应的考务工作;每一道程序都是全程专业的,逐一消除考试各个环节的随意或仅仅依据某个领导旨意的行为;每一个细节以专业的标准和行为规范为依据,在遇到争议或不同意见时,用专业的标准判定是非,而不是依据行政指令行动。这才是减少出现差错,提高各类考试质量的工作大方向。

专业主导并非不要行政参与,但必须划清专业与行政的权力边界,行政人员在考务工作中也必须遵循专业的规范,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行政人员还必须做好自己行政职责范围内要做的事,不能推卸责任。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实习生 郑好

“你学的是数学专业,现在要找一份销售类的工作,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你确定原来的专业就不要了?”国内某知名求职节目中,主持人面对转行就业的研究生小黄,流露出一丝惋惜。

“是的,我确定!”小黄说。“原因是什么?”主持人问。小黄支吾了半天,给出了一个“专业兴趣不足,感觉自己适合做销售”的回答。然而,台上的招聘老板们并不满意。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大学生跨专业就业并非稀罕事,但是有多少人进行过理性分析,前期作好跨专业准备,不禁要打上问号。大学生跨专业就业中存在的频繁跳槽、工作动力不足等问题,或许可以在实习中找到端倪。

迷茫型实习:敢问路在何方

大一暑假在保险公司实习,帮忙整理资料、接待外宾;大二暑假在家教公司做行政助理,回答家长咨询。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大二学生赵蕊暑假里并不轻松。她最中意的职业是人力资源,可父母认为环境科学的就业机会在增加。“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只好专业与兴趣作两手准备。”

赵蕊甚至预想了大四的实习企业,可始终未将本专业实习列入计划表。“挺迷茫的。”她一度感叹。

赵蕊之所以迷茫,在于选择了一条更难以抵达的路。根据教育数据咨询公司麦可思的调查,2012 届已签约毕业生中,近七成人有与“专业相关”的实习经验;只有与“专业无关”的实习经验者,签约率仅占 15%。

职业规划师林少波表示,他并不鼓励大学生盲目脱离本专业,“因为一旦脱离本专业,外界对求职者的专业认可比较难,之前积攒的人脉资源很可能用不上,最糟糕的情况是专业没得到实践,跨专业也没得到成长,两边全耽误。”

尝试跨专业实习,大学生也可能有别样收获。今年夏天,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大二学生李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去了一家国学馆做培训助理。因为不喜欢本专业,李想本想借着暑期体验社会,在实习之初并没有作太多规划。但两个月的实习却让她下了一个决心——将来报考中文信息处理方向的研究。

林少波指出,跨专业实习主要培养的是知识和信息转化能力,与非同知识体系和逻辑的人的沟通能力、应变能力。

“选择实习应尽可能从事与专业有关联的工作,哪怕是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如果实习与专业实在不相关,要更多地学会适应职场的普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遍道理,因为世界是平的,道理是通的。”林少波说。

微调型实习:方向在实习中校准

孙晓磊的学习、工作经历,经过了“三级跳”——本科在河南大学学习新闻学,研究生在北京邮电大学攻读网络传播,目前的职业是某留学机构咨询师。

“与其说‘跨专业’不如说‘细化专业’。”孙晓磊说,“三者有很多联系,对我来说是一个目标逐渐清晰的过程。”

本科期间孙晓磊在报社实习,打杂的活儿居多,更重要的是“记者虽然能够发现问题,但却不能改变问题”;研究生期间他曾到某研究院实习,很好地开阔了学术眼界,但是他认为这个岗位仍离解决实际问题甚远。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实习是研究生期间在某网站做网络编辑,那像是他第一次接触网络媒体。“之前的实习,我就像是一个‘旁观者’,无法改变什么;但是那次实习让我有了‘参与’的感觉。”孙晓磊说,“这种感觉很美妙。”

“选择实习应尽可能从事与专业有关联的工作,哪怕是不同行业、不同岗位;如果实习与专业实在不相关,要更多地学会适应职场的普遍道理,因为世界是平的,道理是通的。”

后来从事留学行业,他不仅运用到了媒体中所学到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中需要设计解决方案,这正与他一直追求的工作相吻合。中国农业大学就业办主任李洋表示,大学生通过实习,实现就业方向上的“微转移”,使所学的专业知识,结合个人的爱好、性格、能力和职业倾向得以发挥,是一种理想的就业方式。

林少波提醒大学生在微调就业方向时,应该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行业前景,是朝阳行业还是夕阳行业;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第二,企业前途,是纯粹要赚钱,还是有远大的使命?第三,老板见识,是目光短浅的小生意人,还是远见卓识的大企业家?“三者最好都能达到最优状态。”

目标型实习:提高难度是上策

这两天,王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喂,同学你好,请问有时间吗?我想做一个电话采访。”王益是某“985 工程”高校物理学大三学生,当一名记者一直是她的理想。可惜的是,高

走近“千人计划”

蒋庆:中大工学的探路者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蒋庆 现任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教授。主持中山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设,带领团队成员围绕关节工程、靶向输药与药物控制释放技术和医疗仪器设备三个方向开展研究工作。在中山大学“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下,建成广东省传感技术与生物医疗仪器重点实验室、广州生物医疗仪器设备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学科建设强调文理医工,校长许宁生曾多次提出,中山大学的发展要与广东的经济发展地位相匹配,为国家的需要提供智力支持,就要加强新兴工科的建设和发展。

2009 年,蒋庆作为中组部第一批“千人计划”学者归国,成为中大工学院的“当家人”。

在校园,大家亲切地把他唤作“蒋千人”。“蒋千人”有几项惊人之举:把本科一年级学生引进实验室做科研,谁想学生们竟做出个国家级获奖项目;他和许多“千人”学者不同,从未埋怨过本土科研环境难以适应,反倒是在取得科研成果后

首先感谢党组织。

工学院建设不能靠“拿来主义”

1985 年,蒋庆从华中科技大学出发,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海外的优越生活并没有冲淡游子的情怀。每逢假期,蒋庆就像候鸟一样,“飞”回祖国,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担任客座教授。

与眼下大量移居海外的人不同,熟知中国历史、西方国家现状的他认为,作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国外,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美国做了 20 多年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一回国就要担任一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如何适应新角色,帮助中大找对发展路子,蒋庆从未有过懈怠。

回国前,他恶补了大量“功课”,读得最多的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要了解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是什么,了解国家对工程人才的要求和期望。”

在美国,公司的研发能力绝不逊色于大学,硅谷公司从来不找大学老师讨论当前的硅技术,只问取代硅的半导体材料是什么;回国后,蒋庆走访过大量工业界企业发现,国内企业普遍缺乏研发能力,跑来大学咨询的均为市场上可见的技术。

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大学工学院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不能照搬欧美大学的模式,一定要服务于地方工业需求,国家经济发展需求。

“要么不办(工学院),要办就要掌握核心技术,服务工业、服务地方;要办就要进行资源整合,不要搞恶性竞争。”蒋庆暗下决心。

每一门工学对应了一个行业。目前国内生命科学的研究仅停留在科学层面上,尚未形成真正的生物工程行业。蒋庆牵头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把生物科学的成果转化当做学科标准。

新建一个工学院应该与广东经济互补。华南理工大学在道路交通学科上有优势,蒋庆就

把交通运输工程的焦点转向城市管理,关注台风安全问题和高铁、地铁的安全监测评估。

大一学生的特殊待遇

大一就可以进入实验室,跟着“千人”学者做国家级课题。工学院本科生的特殊待遇,让其他学院的学生无比羡慕。

2010 年,生物医学工程从医学院“搬家”到工学院。为了转变培养思路,实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大停招了一年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目前工学院该专业只有一届学生,57 名本科生被分为 6 个组,每个组设有一个导师团,由教授和副教授牵头,讲师、博士后、研究生加入。

“工科学生不注重可重复性,就好比制造汽车,10 辆里坏了 2 辆,成本太高。”蒋庆打了个比方。从此,他更加坚定了让大一学生进入实验室打好基本功的信念。

“本科生虽没有高深的数理化准备,但他们的思想是活跃的,而做工程的项目应该来自于创新性想法。放手将大项目中的子项目交给本科生,本身就是开拓学生视野的一种方式。”蒋庆说。

为了不让学生们把实验课归为感性认识,中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两个方向 4 年本科学习中,共设计有基础实验教学、综合性实验教学、专业创新实验教学三大板块,26 门课程单独开课,不再穿插于理论课中,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最让蒋庆自豪的是,仅第一年招生,本科生的科研项目就“开花结果”了。“2011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本科一年级

学生陈涛获得国家级项目,另外 5 名本科一年级学生获得省级项目。

为大学与企业搭一座桥

“大型的 CT、核磁共振仪器是重要的医疗器械,你们大学为什么不做?”有人曾问蒋庆。“大学科研不要去做链条式的工程,而是要攻克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环节。”蒋庆举例说,工学院没有制造人工器官,而是选择开发大规模细胞扩增技术及其装备,这是实现人工器官量产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装备。

蒋庆发现,大学与企业虽有合作的愿景,但很多时候却很难“一拍即合”——大学有科研能力,但无力实现产业化;企业急需“拿来就能用”的科研,但对技术开发者很难放心。

为了拍响这个巴掌,蒋庆摸着石头过了一趟河。在广州市委组织部、中山大学的支持、校友天使资金赞助的情况下,他组建了生物科技公司,为大学与企业搭桥。

蒋庆更热衷于把这家公司比作“孵化器”。他解释,质监局认可的是按工业标准生产出来的样品,而非大学实验室里换个人、换个时间就不一样的样本。这家公司的妙用就在于承接工艺生产线,实现产品规范化。

大学教师是公司的智囊,可他们有教师序列的考核标准,如何调动其产业化积极性?最近,蒋庆又摸着石头过了一趟河,订下了一套由公司负责引资,支持校内科研的计划,从源头上培养大学教师的应用研究理念。

“教师最多只能做技术上的支持,真正的产业化转换还要建立一支工程师队伍。”蒋庆想得很明白,“要走出去,与公司争夺人才。”

目前,这支用科研经费招聘来的工程师队伍,分布在公司的工程技术部和生物化学部两大部门。要留住并壮大这支队伍,蒋庆认为光有软环境、薪酬保障不行,他正在努力争取工程师的职称晋升空间。